

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

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

(1898—1919)

名誉主编	王元化
主 编	胡晓明
编 著	胡晓明
	李瑞明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再认文学上海(代总序)

胡晓明

若干年前,去看施蛰存先生。施公见面即问:“你的博士论文,做了什么题目?”答曰:“《中国诗学之精神》。”施公随即摇头:“这个题目太大。”那时,我心里还真有些不以为然。年轻时不敢做,何时才做?等到这些年多少看了一些近代文学的材料,再回头看看自己从前那以“中国……”为题的文字,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寅恪先生自许平生为“不今不古之学”,且说其常识的意思:因为中古以前的材料太少,太易于逞新说,而中古以后的材料又太多,不易于深透把握。寅恪先生是那样兼具谨严精审的眼力与通达大气的史识,做中古的学问之所以能出绝大成绩,他的性情与学问材料之间有一种恰当的配合,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有人曾以生命的长度与中国文史材料的程量作一简单比较:先秦两汉,患材料太少;六朝隋唐,稍少;宋,可能刚好相等;元明,材料或多出一倍;清代,或须几辈子才能消化材料;近代,又比清代多出不知几倍……。面对至今仍然尘封于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的大量近代文史材料(且不必说近代人已经消化了的前人材料,亦构成今人掌握的“近代文史材料”之一部分),要想做近代文学的综合研究、宏大叙事,——咄!你孙悟空再是有天大本事,也还得乖乖地跟着唐僧一步一步走来!

因而,当三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大康、山林等诸友开始着手《近代上海文学与文献》的课题时,我们真的只想本本分分地划定上海的

范围,从编年材料做起,一家一家地查访,一笔一笔地考述、过录,老老实实地做文学文献学的基本工作。我们的想法是,既然我们这几人皆以文体为专攻,何不从分体文学(即诗学、词学、小说、戏曲、散文)的角度,齐头并进,大家各自去做一种系年,——以作家作品、文学现象系时、系地的双重努力,去共同凸显文学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真实面目?而近几年来,编年史体裁又成为文学研究更进一步走向客观实证、文学史撰写回归本土传统的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探求。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:“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,不论叙事、说理乃至写景、抒情,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;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、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于一炉。《左传》,特别是《资治通鉴》,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。……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是很不够的。”(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》)处于史料纷繁、著述草创的近代文学,我们更是在这种学习尝试之中。譬如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各自有其相当不同的特点,如有的内容在某一时期特多,有的相对来说较少,这就决定了有的时间范围较长,有的则相对较短。有的文体,其重心在于传媒(如小说、散文),有的则重点在诗友结纳的作家活动(如诗词),这也决定了系年的编撰不能强求一刀切,须尊重文体各自的特点。尽管如此,这个课题仍能以前所未有的材料、整幅的细致的文体发展过程、丰富复杂的作家交往、作品接受状态,及丰富多样的文学事件、精神生活细节以及鲜明的时代地域文学的特征,去网罗散佚、拾遗补阙,完成一件文学学术上的新追求。——三年之后,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套以“初编”命名的丛书。^①

^① 陈大康教授的“近代小说系年”一种,由于先期完成,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此外,报刊中的诗词作品,虽然已有《申报篇目索引》等重要工具书,但大量文艺期刊及大报副刊,其中分体文学篇目索引有待于更进一步大规模的集体科研的努力。这套丛书暂不涉及。

回想起来,当我们真正亲手触摸近代上海文学的材料时,竟会有一种开荒、探险的意味!好比上黄山:戴上旅游帽,跟着前面的小旗子,走那人流熙攘的大道么?你也可以不这样,你发现竟然可以有无数的小道,通往人迹罕到的风景,予人以莫名的兴奋!首先是新材料新问题太多。有朋友说:唐诗宋词,新材料都没有了,新题目都做完了!有人曾专门撰文指出,在中国小说学的领域里,重复研究的大量精力,花在寥寥可数的几部名著上,而许多近代小说,几乎是无人去碰的。在诗学词学的领域里也同样。比如在上海住过多年的陈三立,诗才之大、诗功之深、诗艺之妙,置之李杜苏黄前,绝无愧色;而思想文化之复杂魅力,则有过之。其实他那句“来做神州袖手人”,完全是愤激之辞,他哪里是不关心国事的自了汉!而我们的学界,多年来就因为他“不进步”,连他的诗集都没有人去整理。陈三立同时的诗人词人如沈曾植,这位与文化上海关系极深、被他的学生王国维誉为集清代学术之大成的老师大儒、被张尔田称“其诗自是千古”的大诗人,其诗学,钱仲联先生评为“发千古之秘”,——可是,他的集子《海日楼诗》的注本,据说由于难度太大,在出版社一放就是十载春秋,七易编辑!^①且不要说进一步的研究了。近代重要诗人词家,如朱祖谋、夏敬观、况周颐、陈宝琛、沈瑜庆、李宣龚、黄节、杨钟羲、金天羽、吴庆坻、徐珂、陈曾寿、冯煦、陈夔龙、瞿鸿禨等人,似乎都没有人去为他们编年谱,有的甚至连小传、志略、行状等都没有。而近代的诗社、词社,仅上海一地而言,就有超社、逸社、星社、南社、寒隐诗社、希社、春音社、沅社等,此起彼伏,参与之人数、旨趣之歧出、成因之多元,皆为传统中国所罕有,而深具文学社会学的丰厚意

^① 在此编校样到来之前,我幸已收到中华书局顾青先生寄来的钱仲联教授注《海日楼诗》。

涵。近代的流人文学、报人文学、名士文学、遗民文学……皆构成极丰富多样的文学“未命名群落”，仅辛亥之后几年，诗学之美盛，可谓以一地敌一国，足当陈三立所谓辛亥后“获偿而荷其赐者，独有海滨流人遗老，成就赋诗数卷耳”。再看上海近代所接纳养育的众多诗人的构成情况，他们当中有教师、地方官、布衣、青年学子、遗老、艺术家、翰林院的编修、改革的政治家、巡抚大人、革命党人、和尚、贵公子、同盟会的干将与出版家、商人等等。其社会成分之复杂纷纭、其作品所体现人文景观之异彩纷呈，应不亚于六朝、隋唐的文人世界。而小说种类之繁多（有人统计有250多种^①）、外来刺激之活跃（舶来品如政治文学、科幻文学、未来文学等不一而足）、传统新变之多样（由士子而报人艺人文人、由旧文学而新文学外来文学，其中传统资源极有用，待发之覆甚多）可谓中国小说史上的“文体的狂欢盛事”，或“作家的战国时代”，——这一切，与研究的现状当然是极不相称的。

如果再推而论及近代文学所蕴含的思想课题的丰富性，则除了重视材料的开发之外，不能不承认“范式”的转换所带来的新视角仍是十分必要的。人们早就发现近现代史学远比近代文学活跃、有新意、有力量。在我有限的泛读经验中，在原有的反帝反封、爱国主义之外，有不少新观照点和解释框架都被提出来了，譬如所谓“秩序危机”（林毓生《近现代中国史上若干重要问题》）、“身体与灵魂的双重危机”（张灏《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》），所谓“未完成的现代性”（哈贝马斯一本书的书名，李欧梵《现代性的追求》）、被压抑的现代性（王德威《想像中国的方式》）（后二者是从哲学中得到借镜），所谓“连续与变异”、“外来的合法性”（柯伟林《认识 20

^① 参于润琦：《清末明清小说分类简述》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学术论文，福州 2000.10）。

世纪的中国》)等,并非老病复发又回到那喜谈“中国……”的宏大叙事,也并非总是随哲学、史学之后而没有文学的独特声音,而是我切近地感知了近代文学所含有的思想富矿,实不忍再认文学仅是文学而已。尤其是上海,承接几千年人文渊薮的江南文化的氤氲化育,容受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、南北政经气候之波诡云谲,面迎欧风美雨呼号拍击、中西文明交汇最新鲜、直接、强大的冲击与回应,比汉唐文学更为精彩的文学历史,倘若不能观水观澜,而尽其义、而传其神,岂不可惜、岂不可惜!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株守一家一门之言,或仅仅削足适履地、以一种貌似学科分工、实为形式主义的观点,拘执于所谓“文学特性”,而是将文学置于更大更真实的“上下文”之中,我想近代上海文学在将来的学科发展中,一定会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比现在更大的贡献。这是我写在前面的一点感想,至于朝向目标的努力,仍是一步步地走去。

2001年11月于日就月将斋

前言

面对近代上海诗人及其诗作极其丰富这样一个事实,在对其系年时,划定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落,就成为首先要考虑的事情。

我们初步拟定的时间上限是 1898 年,下限是 1919 年。这样做,除了从诗歌数量方面考虑外,更主要的是着眼于近代上海文化的发展脉络。

我们知道,上海开埠是在 1843 年。19 世纪 60 年代是近代上海社会、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。当时的战乱,使相对安全的上海获得了第一次超常的发展,也成为当时文人士子避难安身之处。他们依托上海,引西学,办洋务,将上海变成了近代学术思想中经世思潮的重镇。“据旧学之基础,展新学之探讨”成为这时学风的新特点。到甲午年前后,上海已成为各地文人学士的走集之所。但甲午一役,打破了洋务运动在器用层面强国的幻梦,也促发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与行动。于是,在戊戌年以前,诸如强学会(1896 年)、农学会(1897 年 5 月)、译书公会(1897 年 10 月)、蒙学会(1897 年 11 月)以及时务报馆(1898 年 8 月停办)等纷纷成立,主张革新、倡言变法之声日涨,但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和随之而来的清廷对维新士人的迫害、打击,迫使有心改革的士人逐渐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疏离,而且这种呼声也逐渐退隐。不久,庚子年“带甲天地”,京师士大夫多南迁至东南互保之区,那些有不同抱负志向的士人,更把上海当作了寻觅同道、研讨新学、实现其经世理想的舞

台,这以国学保存会与南社诸同人为突出代表。辛亥后,国故更张,大批倾心清廷的士大夫流寓海上,成为“海滨流人”。此时,“当国变,上海号外裔所庇地,健儿游士群聚耦语,睥睨指画,造端流毒倚为渊薮,而四方士大夫、雅儒故老,亦往往寄命其间。”(陈三立《清故江苏补道庞君墓志铭》)在旧派,优游岁月,诗酒流连;在新派,南北走集,倡言救国。多方荟萃,且有各自的话语系统与活动场所。至《新青年》杂志移至北京(1918年)与“五四”运动起,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逐渐北移,接下来就是一新局面。

因此,通体来说,戊戌年可当作是近代上海文化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。本此考虑,以后22年间的诗歌创作为文献资料,多方搜寻查考,以客观、平实、存真的态度,比较集中的系年编排,希冀以此系年,力求填充近代文学尤其是诗学研究中的一块空白。

那么,近代上海诗歌的价值何在?在编排中,我们发现,这段时间的诗歌创作,以辛亥后的几年为最丰富,诗人也最多。大量的诗作,举凡周遭琐事、交际应酬、山光景致、新异风俗等,提供了观察近代上海文化的重要侧面。更要者,“辛亥之乱兴,绝羲纽,沸禹甸,天维人纪,寢以坏灭。兼兵战连岁不定,劫杀焚荡,烈于率兽。农废于野,贾辍于市,骸骨崇邱山,流血成江河,寡妻孤子酸呻号泣之声达万里。其稍稍获偿而荷其赐者,独有海滨流人遗老,成就赋诗数卷耳。”(陈三立《俞觐庵诗存序》)这个概括,虽针对所谓“海滨流人”而言,辞情激愤,却也深得当时大部诗作之实相。在客观上,提供了认识近代知识阶层角色转换的第一手参资。

而且,近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的“同光体”,其名目虽起于光绪壬午(1883)年,其主要观点却在民国后形成。这不但是《石遗室诗话》成自民国(1912—1919)而已。其他“同光体”巨子如陈三立、沈曾植等,也在这段期间有系统地形成了他们的诗学观点。举其要者,如陈氏《观赏宋刻任渊注山谷内集》、胡梓方自京师寄新篇并

索题句别墅萧闲赋此答之》及《次和伯夔生日自寿专言文章以祝之》等诗，对“同光体”的诗学取自与祈向作了深刻阐述。沈氏《以新刻西江诗派二家集呈止相用枝字韵》《渔阳生日诗》及《止庵诗叙》等诗文，阐发了“同光体”诗派对诗史的新见，而在《与金甸丞太守论书》中，提出了更具新意的诗有“三关”说。

在这段期间，酝酿、成立、壮大乃至解散的南社有充足的表现。其诗作，一言以蔽之，是龚自珍式的“剑气箫心”。高言大调，时兼缠绵低徊，《水浒》《红楼》，先后迭咏。师心任气，一意自为。然要不失其青春浪漫之概。

处乎二者之外，有属“晨风庐唱和集团”者。周庆云以南浔巨商流寓沪滨，筑晨风庐，纠集流徙沪淞落魄失意之士，消寒雅集，淞社聚首，诗酒花间，迭相唱和，称美辞，颂佳声，其可多者，间或露其身世时势飘零动荡之感。总体而言，其诗多不足称，但亦可见当时流徙海上诸人精神面相之一二。

此番系年，本属首次，其中难处，编者自知：一是空无依傍，虽差互查证，诗作错植、遗漏或难定者必不可免。故南社诗人诗作难确定者，列为附录一。二是诗集繁多杂碎，散存多方，且时人多称雅号，苦于指实，按名索书，往往徒劳。故知其名而未见者，列为附录二。

目 录

凡例.....	1
1898 年	1
1899 年	7
1900 年	15
1901 年	23
1902 年	28
1903 年	33
1904 年	42
1905 年	51
1906 年	58
1907 年	67
1908 年	75
1909 年	84
1910 年	96
1911 年	102
1912 年	118
1913 年	164
1914 年	219
1915 年	261
1916 年	294
1917 年	320

2 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

1918 年	338
1919 年	354
附录一 南社社员诗作中确为上海作然 不能确定系年者	373
附录二 有待查考或诗集未详的诗人与 诗集目录	381
附录三 重要人名索引	385

凡 例

一、书以时间为经，初次叙述近代上海诗人及诗作的历史。篇幅所限，特为截取 1898 至 1919 这段时间，以编列多种重要未刊资料。

二、近代上海诗人及诗作，是指以流寓（含短暂停留）为主，包含祖籍上海、南汇、奉贤、嘉定、松江、金山等的诗人及其文学活动。

三、上海是近代“同光体”和南社以及其他诗派的主要根据地之一，诗人活动极为频繁。本书包括较重要的诗人、能诗的学者以及有诗歌作品的其他方面人物。

四、本书兼有系年与系地两种功能：所收录的诗歌作品篇名，全部能从时间（以年为单位，一般用公历并参照夏历）和空间（上海，包含目前的行政区域）给予确定，力求全面、详尽、准确。因体例所限，本书不专门列出考证文字。

五、本书的编排顺序是：年度大事概述、诗人行年、诗题、诗选、附录。大事只排列有关的文化活动或事件；诗人编排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，凡第一次出现的诗人，给出简要的生平介绍，且对重要诗人选录一些序跋；不能确定生平的诗人，一律排列当年的最末。诗选部分，一般选录当年一至三首（个别重要的诗人可稍放宽；唱酬诗作一般不录），以叙事的重要性和艺术性为主。不能确定时间的诗题，列入全书的附录。此外，待查的诗人或诗集不详者，亦列入附录，以便进一步的查考。

六、本书所收诗作，主要来源于可查考的近人未刊别集，基本

2 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

不包括上海近代文艺报刊和大报副刊的诗作,旨在凸显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诗人在上海的生活及创作活动。报刊诗作的系年(旨在凸显作为文学创作的媒体本身的影响力)将专门另编为一种。

七、本书所使用的资料,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、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、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、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、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以及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等。

1898 年

(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九日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十九日)

大事记：

2 月，薛绍元主编《求我报》半月刊创刊。3 月 13 日，朱开甲等创办《格致新报》。5 月，《采风报》创刊，吴趼人主编。7 月，上海书局出版署名抽丝主人的《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》(前后集各 50 回)。24 日，上海女学会创办《女学报》，为中国最早的妇女期刊。本月罗振玉创立东文学社，是上海第一所开设日文课的学校。8 月 11 日，《时务报》停刊(共出 69 册)，另出《昌言报》旬刊，汪康年为总理，梁鼎芬为总董，11 月停刊(共出 10 册)。17 日，《汇报》创刊。9 月，汪大均创办《工商学报》周刊。

本年，马建忠的文言文法著作《马氏文通》由商务印书馆出全。同文书局刻印日人中江笃介的《民约通义》第一卷。王国维抵沪，入《时务报》，任书记、校对之职。李叔同从天津携眷南下至沪，入城南文社，参加文社的课会、课试。

陈宝琛(1848—1935)，字伯潜，号弢庵，福建闽县人。同治七年戊辰进士，官翰林院编修。有《沧趣楼诗集》十卷。陈三立《沧趣

楼诗集序》：“公早岁官禁近，已慷慨以身许国。勇于言事，章疏数十上，动关匡拂朝廷、培养元气大计，直声风节倾天下，初未遑狃章句、求工于诗也。法兰西犯边，诏移公由江西学政会办南洋防务，坐微罪被谴，废居乡里，竟二十余年。戢影林壑，系心君国，苾抱伟略，郁而不舒，袖手结舌，无可告语。先放之岁月，遂假吟咏自遣，又尝出游江南、广州暨南洋群岛，纪程之作亦稍多焉。及垂老，召还辅导冲主，国势已岌岌不可为，俄迫禅让，坐睹沧胥。处维系纲纪、斡旋运会之地，万变袭撼，寤寐交瘁，偶就余闲写胸臆，即集中后数卷所得诗是也。公生平遭际如此，顾所为诗，终始不失温柔敦厚之教，感物造端，蕴藉绵邈，风度绝世，后山所称韵出百家上者庶几遇之。然而，其纯忠苦志，幽忧隐痛，类涵溢语言文字之表，百世之下，低徊讽诵，犹可冥接遐契于孤悬天壤之一人也。”

本年路过上海，与张佩纶会晤。

编年诗：

《沪上与蕙斋会话》《沪上晤蕙斋，三宿留别》《婉女随婿入都，过苏省亲，送至上海》

诗选：

《沪上晤蕙斋，三宿留别》：（其一）相看短发未全斑，十五年来一瞬间。可似东坡遇莘老，安排浮白对青山。（其二）却将谈笑洗苍凉，三夜分明梦一场。记取吴淞灯里别，不须寒雨忆洪塘。

文廷式（1856—1904），字芸阁，号道希，晚号纯常子，江西萍乡人。光绪十六年进士，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。有《文道希先生遗诗》。陈三立《文学士遗诗序》：“夫薰以香自烧，膏以明自销，自古贤人才士怀负奇伟，动与祸会，遭戮辱屏弃摧落者，不可胜数，况厄于一时，愈伸于百世，是岂足道哉！久之，君返自东瀛，复时与君游聚，过金陵必主余家，留连啸咏，意气不衰，最后饮秦淮别去，遂永

诀。君撰著宏富，诗词特鳞爪耳。然君博极群书，诗乃清空华妙，不捋撙故实自曝，尝推为独追杜司勋，波澜莫二，即身世漂泊亦颇肖似之，此可悬诸天壤，俟论定者也。独是君歿未十岁，国步骤改，九宇沸扰，余屡转徙穷海，老病复迫之，残夜孤呻中，追忆君箕踞挥麈高睨大谈，往往揣君声音笑貌浓眉皓腹辟易千人之概以自壮，无如斯人不复得，景光之不可把玩，读君诗益缠兴亡离合死生博一瞬之感也。”

本年寓沪，四月晤沈曾植。八月政变作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皆逃亡，文在沪藏匿，有被捕之谣。

编年诗：

《戊戌人日作》《感事》（二首）《拟古宫词》（二首）《海上绝句》（四首）《中秋夜作》《夜坐》《和杜三韵三篇》《答沈子培刑部寄赠》《养痾有作》

诗选：

《拟古宫词》：（其一）各倚钱神列上台，建章门户一齐开。云阳宫近甘泉地，两度凉风落玉槐。（其二）月槛风廊拟未央，少游新署芝游郎。一时禁编钞传遍，谁是凌云韦仲将。

《中秋夜作》：桂魄销沉夜气寒，螭龙愁掩水晶盘。山阳下国成名异，湘水微波寄迹难。海阔倘容精卫塞，心孤惟共晚枫丹。不须更听邻家笛，白露庭楸恨自漫。

《答沈子培刑部寄赠》：事幻程生马，途难蹇上天。藏身无尺木，坠翮警空弦。恶草谁除蔓，芳兰不惜煎。贾生徒碌碌，一任大钧权。

沈瑜庆（1858—1917），字志雨，号爱苍，别号涛园，福建侯官人。光绪举人。官至贵州巡抚。有《涛园诗集》。沈曾植序云：“涛园之诗，要当合其无韵之文字，平生议论简牍杂文，参伍错综，互相

证,交相发,而后意匠所经营,所谓居要而警策,所谓词高而意远者,乃视而可识。其特工于发端,诚有所谓剥落数十重者。其称古事以况今,亦往往别有会心,绝离寻常心识径路,自擘笺分韵时,合志同术者,仓卒且不能喻,欲自释而曲折不能词达,而安得期诸异世之人,而安所得山谷之天社、荆公之雁湖,为绌绎其旨,笺其字句,发其微抉其隐乎?……昔君偕余登钟阜之颠,下视台城,长江汤汤流天外,日落西山,草木异色。余涉忧患多退思,君忼慨仰,偶然有凌轹一世之意,相与瞻眺吟讽。归而就君斋读君诗,磊隤豪宕多奇语,今集中往往佚之矣。余顾谓君,近人言同光体派,闽才独盛。假有张为图者,太夷为清奇僻苦主,君为博解宏拔主!入室者谁,及门几人。君当时意气道上,颇自任,犹若有不足者然。晚岁归自黔中,病后气益平,默默鲜欢矣;而友朋夹持,吟事犹得不废。尝过海日楼,值余昼寝,举苏氏‘睡起清风酒在亡’之句,余起相答,君遂抗声诵终篇,至于‘遥知鲁国真男子,独忆平生盛孝章’,真有若晋人所谓唾壶击碎者。又好诵《左传》子家子语,倨句抗坠,往而不复。余奇其意,亦不能尽其指也。世咸知君为诗好用苏诗《左传》语,举兹二例,君所会于二子者若何,后之读君诗者用心若何,异代扬子云或不无取裁乎!”

1895年受张之洞聘,主持南京筹防局营务处。此后,常寓居沪上,与陈书(冯庵)多有交往。

编年诗:

《夜识亭》《汉廷》《咏史寄虞山师》《宿南塘和冯庵韵》《从冯庵扇读豫生见寄之作》《喜冯庵至,怀漱谷津门》《闻赞如准补迤南道》《海上有高楼》《答冯梦华太守以冯庵原韵》《杂感》《贾谊》《晁错》《留别同乡江叔海徵君》《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写给意书后》

诗选:

《晁错》:老父抱幽忧,智囊不解事。亲支贵梁王,反骨疑吴淞。